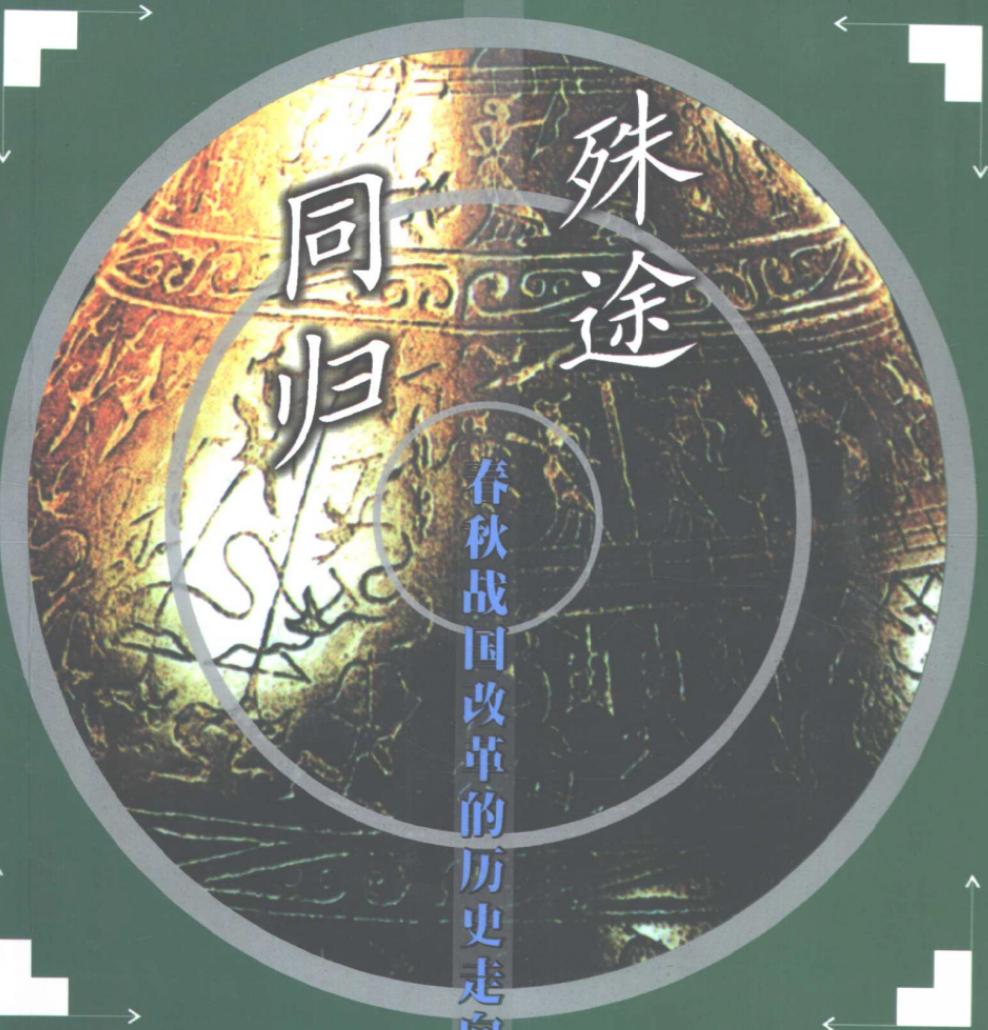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

卞孝萱 胡阿祥 主编



同归殊途

春秋战国改革的历史走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彭安玉 著

卞孝萱 胡阿祥 主编

彭安玉 著

中国改革
史鉴丛书

殊途同归

春秋战国改革的历史走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殊途同归：春秋战国改革的历史走向 / 彭安玉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
(中国改革史鉴：1 / 卞孝萱，胡阿祥主编)
ISBN 7-305-03319-7

I . 殊... II . 彭... III . ①政治改革-研究-中国-春秋时代②政治改革-研究-中国-战国时代 IV .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161 号

丛书名 中国改革史鉴
书 名 殊途同归——春秋战国改革的历史走向
著 者 彭安玉
责任编辑 黄继东
装帧设计 杨小民
责任校对 汪 明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 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0 千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本册定价 12.00 元 (总六册 定价:72.00 元)
ISBN 7-305-03319-7 / K·234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版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596923、3593695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

总序

卞孝萱 胡阿祥

一

改革大潮正以磅礴之势席卷中华大地。

发端于 1978 年的当代中国改革，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辉煌历程。

改革需要理论的指导，改革需要实践的开拓，改革同样需要历史的借鉴。

悠久的中国历史，留给我们丰富的改革遗产。在当代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时刻的今天，系统研究中国改革史，从中汲取改革的精神力量，并廓清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改革的背景、改革的举措、改革的得失等等，这对更好地把握现在，推进现实改革更稳健、更迅捷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贞观政要·任贤》记载唐朝著名政治家李世民的话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本丛书取名“改革史鉴”，其意正在于此。

二

《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宇宙间万事万物无不处于不停的变化、运动之中。大至天体，小至原子，变是绝对的，不

变是相对的。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之中。当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时，当过时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时，改革就必然会出现。

战国时期大改革家商鞅云：“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吕氏春秋》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隋文帝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龚自珍则以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变更。”这些论述都深刻地阐明了改革的必然性。

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有史籍记载的大中型改革有几十起之多，小改革更是不计其数。中国社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中，不断地开辟着前进的道路。人们常说：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改革之势不可逆转。这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深刻洞察基础之上的断语，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三

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变法”、“革新”、“改制”、“新政”云云，大体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挽救危机、维护统治之举，重在体制和政策的厘正和变通；它往往发生在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政治、经济危机已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危急时刻。作为通常人们公认的改革，这当然是改革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不独仅此，在规模、气势、影响等方面更大的一类改革，是改朝换代之后的开国时代之重新制章立典。这样的制章立典，形式上是针对前朝之弊而多所兴革，目的上是求得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对于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这类改革常常具有重大的阶段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同样是出于社会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目的，然而措置失当乃至与客观规律根本悖背者，如王莽的托古改制，我们也纳入了改革的范畴加以论述，并且认为，这样的“改革”也不能忽视。然则以上述

的认识来通观中国历史，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中国历史的演进，正与不断的改革相伴而行；内容繁富、各具特色的改革，正是中国历史这本厚书中最引人入胜、最予人启迪的篇章之一。

四

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改革史，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改革的横断面（分时期或断代）研究；改革的纵向分类研究；改革家研究。

就横断面研究而言，因为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产物，所以改革的发展进程与社会发展阶段是相一致的；在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呈现出汹涌澎湃之势：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改革，其性质都是封建化改革，在改革中完成了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大转化；晚清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改革活跃期，改革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而其核心内容则是企图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这同样是伟大的变革。改革又是统治阶级自我完善、强化统治的手段，以此，改革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盛和败落；不同王朝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民族形势、政治状况、经济条件、文化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了改革的内容与取向。比如秦、西汉的改革，以建立、健全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为核心；十六国北朝以胡族入主中原，汉化、封建化改革就是无可选择的主题。封建社会前期的唐朝与封建社会转向后期的宋朝，改革也表现出不同的面貌：隋、唐前后相继的不断改革，促成了大唐盛世的到来，宋初强干弱枝、分化事权的改革，却导致了两宋冗兵、冗官、冗费的恶果；又契丹、女真、蒙古所建立的辽、金、元王朝，在祖述与变通之间，备尝许多体制尴尬并存所带来的无奈；到了明、清，改革造成了极端的君主专制，改革也最后一次迎来了大清盛世，然而中央集权封建体制走向衰朽，封建社会的没落以至崩溃，却非改革所能挽回。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总序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转化，不同的王朝及其更替，改革有着规模、内容、性质上的不同；以此，中国改革史分时期或断代的研究，可以全面展现改革的背景、改革的面貌及改革的功效，事实上，这也是治中国改革史的传统做法。但改革史研究的另一种方法即纵向分类研究，其实也很值得尝试。例言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由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而宋太祖、明太祖，随着不断的改革而日益加强；地方行政制度，自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来，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症结，政区层次变化不定，划界原则反反复复，机构设置屡次调整，却始终寻找不到最佳的方案；又选官制度方面，由奴隶制时代无所谓“选官”的世卿世禄，到封建社会的养士军功、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科举考选，真可谓不断兴革；再如赋税制度，也有着丰富的改革内容：赋税形式从劳役税发展到实物税再发展到货币税，赋税摊派从以人户为单位转变到以财产为标准，赋税征收由人口税、土地税、劳役等项单独分征演化为合而归一，无不与重大的改革活动相联系。其他诸如中国历代治国思想的嬗变，中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改革，中国历代民族政策与民族治理机构的变化，乃至中国历代改革思想与理论及反改革思想与理论等等，也都是中国改革史研究的上好选题；而且这样的研究，既富学术意义——与改革史的横断面研究互为补充与完善，从而有利于对改革史的深层次把握，也极具现实价值——其间所体现的改革的艰难、反复与伟大，所揭示的改革的规律，所显出的改革的经验与改革的教训，都值得今人深深地反思。

当然，除了以上一横一纵的改革史研究之外，改革家也可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一部改革史，是与许许多多改革家的个人活动紧密关联的；虽然改革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改革的根本目的也都是为了巩固其阶级统治，但只要改革家的举措代表了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这正如范文澜先生在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被统治阶级爱祖国也爱及国家和君主，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爱国家和君主也爱及祖国，只要归根是有利祖国和人民，他们的行动都值得尊崇”；那些“改善政治”、“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的统治阶级人物，“依据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实际贡献，都可以称为爱国者”——改革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正是这种特定意义上的爱国者；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鼓舞、驱使着古代、近代的改革家们勇于奉献、不惜牺牲。然则如此说来，为改革家立传，为改革群体画像，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五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属改革的横断面研究。我们选择了中国历史上一些具有代表或典型意义的时期或朝代的改革，探讨改革的背景、措施、政策，改革中的斗争，改革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我们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协调统一，不故作高深，而力求深入浅出。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改革史研究不可能为当代改革提供现成的模式；当代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另一个亟待全面研究的宏大课题。改革史服务于现实的主要方面，还在于启迪思路；丰富的改革经验，深刻的改革教训，不畏艰险的改革勇气，都可供当今改革家提炼观点，概括规律。至于读者，在阅读我们这部奉献于伟大时代的不成熟的《中国改革史鉴丛书》时，则关键是要汲取古代改革的精神，明了唯有改革才有出路的事实，进而理解改革，参与改革。

是为序。

1999年6月

目 录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总序

引 言	(1)
第一章 长河腾起惊天巨澜	(3)
一、山雨欲来	(3)
二、惊涛骤起	(11)
三、强音回荡	(21)
第二章 东齐改革风高浪激	(35)
一、齐桓公、管仲改革	(36)
二、田氏代齐	(64)
三、齐威王、邹忌改革	(67)
四、齐宣王改革	(80)
第三章 三晋改革风起云涌	(88)
一、晋文公改革	(88)
二、三家分晋	(94)

目 录

三、魏文侯变法.....	(95)
四、魏惠王改革	(117)
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122)
六、韩昭侯、申不害改革.....	(141)
第四章 南楚改革一波三折.....	(146)
一、筚路蓝缕雄据南方	(146)
二、庄王改革开创霸业	(150)
三、吴起变法可歌可泣	(158)
四、屈原改革胎死腹中	(172)
第五章 西秦改革奇峰突兀.....	(179)
一、存亡之际	(179)
二、商鞅入秦	(183)
三、狂飙突起	(186)
四、天下无敌	(199)
五、商鞅之死	(214)
六、余波回荡	(220)
第六章 改革奇葩异采纷呈.....	(234)
一、鲜明的地域特色	(234)
二、殊途而同归	(255)
主要参考文献.....	(267)
后 记.....	(268)

引言

公元前 21 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在黄河流域正式建立。从此中国社会告别原始蒙昧时代，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夏、商、西周王朝前后相续，历时一千多年，除改朝换代的极短暂时期外，基本上维持了大统一的局面。公元前 770 年平王东迁，以此为起点，直至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凡 550 年，是为春秋战国时期，这是由统一走向分裂的动荡时代、多事之秋。秦统一中国后，秦汉帝国复以其大一统的形象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长达 400 年之久！

春秋战国 500 余年，以公元前 476 年为分界线，划分为春秋、战国这两个前后相接的历史阶段。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分裂、复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大动荡的时代。在这一看似简单循环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实质上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性跨越。直观地看，春秋战国是一个分裂割据、混战不休的乱世，然而就是在这种干戈不息、刀光剑影的阵痛中，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政治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前兴盛的局面。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都展示了崭新的气象，激发出旺盛的活力，为秦汉的大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社会的急速变化，其动力来自于各国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在群雄并峙、列国虎争的形势下，不是你吃掉我，就

引言

是我吞并你。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对各国统治者构成了无形的但又是实实在在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面对现实,解放思想,尊重规律,千方百计寻找富国强兵之道,于是有了风起云涌的长达5个世纪之久的、连绵不断的封建化改革的滔天巨澜。

在春秋战国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决定中国发展走向的深刻而伟大的改革过程中,涌现了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魏文侯、齐威王、秦孝公、楚悼王、韩昭侯、赵烈侯、赵武灵王等一大批主张改革的英明之主,崛起了包括管仲、子产、伍子胥、范蠡、伍举、百里奚、丕豹、由余、李悝、西门豹、商鞅、吴起、邹忌、申不害、公仲连、惠施、屈原等等在内的一大批主持改革的时代精英。他们或顺应时代潮流,变革社会,拯救时弊,开创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赫赫霸业;或为了改革洒尽最后一滴鲜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或为实现改革的抱负,百折不挠,奋斗不息,虽壮志未酬,仍九死而不悔。春秋战国时期以管仲、商鞅为杰出代表的这批改革先驱,是一群极富个性、卓有建树、大智大勇的时代骄子,是一批勇于变革、不畏险恶的铮铮铁汉!正是这些时代骄子和铮铮铁汉,构成了本书的主角。

第一章 长河腾起惊天巨澜

在秦国变法前夕的一次大辩论中，著名改革家商鞅以无畏的勇气大声疾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商鞅的呐喊，喊出了春秋战国改革时代的最强音。

——作者题记

历史的长河浩荡向前，流过了夏，流过了商，流过了西周，终于进入风雷激荡的春秋战国时代。长河不再平静，改革、变法的狂潮骤然间汹涌澎湃……

一、山雨欲来

春秋战国改革风暴的出现，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又是各国变法之君为富国强兵、图存谋霸作出的明智抉择。

1. 悲风四起：奴隶制丧钟声声

公元前 539 年，齐国执政大夫晏婴出使晋国。为迎接贵宾，晋国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在国宴上，晋国执政大夫叔向于席间向贵宾询问齐国的情况。晏子长叹一声说：齐国奴隶制国家政权已处

第一章 长河腾起惊天巨澜

于日之将夕的末世；齐君敲骨吸髓，人民饥寒交迫；酷刑之下，被砍去双足的罪人之多，致使“假足”的价格上涨而鞋价下跌。晏婴认为，齐国政权不久将被陈氏家族所篡夺。听了晏婴的话，叔向感慨地说：晋国奴隶制国家政权也同样面临着末世的降临。他摆了以下根据：晋国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官兵严重缺员，战斗力大为削弱；老百姓穷困不堪，道殣相望，而公室却豪富奢侈，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晋国原有的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八大家族，其后人或降为平民，或沦为奴隶；国政把持在大夫的家门之中。齐、晋这两个大国的执政大夫在本应欢愉热烈的国宴上不约而同哀叹本国的奴隶制政权已到了无可挽回的末世，这说明当时社会确已陷入了深刻而严重的危机之中。

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晏婴和叔向只是看到了奴隶制国家在末世来临时的某些衰微表象。他们之间的谈话所及，也远远没有能概括出奴隶制危机的全貌，更不用说他们除了哀叹之外，并未拿出切实可行的济世良策。

事实上，奴隶制的深刻危机并非突然间出现的。早在西周中期以后，曾经强大一时的奴隶制国家政权就已呈现出江河日下的没落趋势。

我们知道，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为基础，奴隶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占有直接生产者——奴隶（实际上，奴隶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生产资料）。奴隶仅是会说话的工具，受奴隶主的绝对支配，甚至连他们的子女也是奴隶主的财产，任奴隶主贵族蹂躏。尤为可怕的是，奴隶主阶级不仅生前残酷地压榨奴隶，死后还要用奴隶殉葬，在祭祀时用奴隶作人牲，“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①。奴隶们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悲惨的生活，不断起来斗争。怠

^① 《墨子·节葬下》。

工、破坏工具和逃亡是他们经常采用的方式。《易经·讼》记载，有个奴隶主出去打官司，邑中居住的 300 户奴隶乘机逃跑了。西周晚期乃至春秋时期，奴隶的逃亡斗争更加频繁而激烈。《左传》僖公十六年记载，公元前 644 年的冬天，淮夷包围了鄫国。当时的霸主齐桓公为解鄫国之围，会合诸侯于淮水旁，让齐、鲁、宋、陈、卫、郑等 10 国被征发服役的庶人修筑鄫城。由于天气严寒，加之工期紧迫，不少人都累病了。一天深夜，有一个庶人爬上土丘大声高喊：“齐有乱！”这一喊，喊醒了梦中的庶人，他们在慌乱中全部逃亡了。这次奴隶的逃亡反抗，中止了齐桓公的筑城计划，东征淮夷的计划也落了空。有的国家甚至因为“民溃”（奴隶逃亡）而亡国。如公元前 641 年，位于今陕西韩城南的梁国国君大兴土木，强逼庶民筑城墙，挖壕沟。庶民忍无可忍，一齐逃亡，秦穆公趁机灭了梁国。《公羊传》分析梁国灭亡原因说：“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

工匠暴动也是奴隶反抗斗争的重要形式。公元前 478 年，不堪卫庄公长期奴役的卫国工匠起而暴动。愤怒的工匠们进攻卫庄公，平常不可一世的卫庄公吓得浑身哆嗦，在宫门外连连求饶。工匠们继续进攻，仓皇中，卫庄公带着太子疾和公子青从北宫墙跳墙逃跑，连腿都摔断了。附近的“戎州人”闻讯也攻打卫庄公，杀死卫庄公及其太子疾、公子青。^①

《诗经·魏风·硕鼠》有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是不堪忍受奴隶主残酷欺凌和压榨的广大奴隶对吃人的奴隶主阶级的诅咒，典型地描述了奴隶们渴求生存的心境。固然，“乐土”在当时是一种幻想，但“民有远志”^②，那些寻求“乐土”的勇士们，结成

^① 《左传》哀公十七年。

^② 《国语·周语上》。

第一章 长河腾起惊天巨澜

小股，啸聚山林，开展武装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所以，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多盜”的现象。如“鲁多盜”^①，季孙因此曾责备司寇臧武仲无能。季康子也因“患盜”^②而向孔子请教对付办法。晋国则是“盜贼充斥”、“盜贼公行”。^③各地的“盜贼”终于汇成了一支支起义大军。《庄子·盜跖》说：“盜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人保”。《荀子·不苟》则称盜跖“名声若日月，与尧舜俱传而不息”。与盜跖齐名的还有战国时的庄蹻起义。《韩非子·喻老》记述庄子对楚王说：“庄蹻之盜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

如果说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已使奴隶主贵族胆战心惊的话，那么，“国人”暴动则使他们魂飞魄散。国人是一些失势的贵族的后裔，居于国都之内。国人与奴隶主贵族的矛盾在周厉王时期一度达到白热化。周厉王禁止国人利用王畿内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这一禁令激起了国人强烈愤怒，他们谴责痛骂，议论纷纷。周厉王认为这是对他的诽谤，遂派人监视国人，禁止他们议论，违者处死。从此，国人在道路上相遇，只能以目示意，不敢说一句话。召公提醒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④但厉王拒不听谏。国人忍无可忍，举行暴动，攻进王宫，周厉王仓皇出逃。春秋时期，国人的反抗斗争更加频繁。《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卫懿公昏庸无道，对国人困苦不闻不问，却爱鹤如命，有的鹤享受大夫的俸禄，坐大夫才能坐的轩车。公元前 660 年，狄人攻卫，卫懿公下令国人死守。国人嘲讽道：让你的鹤去打仗吧！无奈之下，卫懿公只得带着亲兵抵抗狄人，结果全军覆没，卫懿公被杀，卫国

①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② 《论语·颜渊》。

③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④ 《国语·周语上》。

灭亡。

奴隶和国人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给腐朽的奴隶制以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奴隶们的大规模逃亡,使得奴隶主贵族失去了大量劳动力,从而出现了“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①,以及仓库破陋、川泽失修、道路不治的衰败景象。但是,这些反抗斗争还只是奴隶制危机的表象,奴隶制更深刻的危机在于支撑其统治的井田制度、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土地属于天子所有,不得随意买卖和转让。井田制的危机是由生产工具的变更和进步引发的。春秋以来铁制农具的出现和广泛使用,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得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成为可能。奴隶制时代“千耦其耘”的大规模集体耕作方式,已成为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而新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在牛耕铁犁的牵引下,破土前进,充满着生机与活力。随着私田开垦的数量不断扩大,原有的井田疆界逐渐被破坏。在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井田内的公田已可用于交换和转让。私有土地的出现和土地交换的进行表明,井田制开始瓦解了。

分封制是奴隶社会最为根本的政治制度,但春秋以来,王室衰微,列国并峙,兼并战争连绵不断,其结果诚如《汉书·地理志》所称:“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向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分封制既坏,郡县制兴起。随着分封制的瓦解,作为奴隶制政权组织形式的宗法制以及维护宗法等级的礼乐制度也开始动摇。周天子虽为天下之“大宗”,却失去了大宗的至尊至贵,诸侯不再定期朝觐,甚至天子驾崩,亦有不赴奔丧者。诸侯对天子来说虽为“小宗”,却掌握了“礼乐征伐”的大权,有的还僭越称王。卿大夫对诸侯来说虽然也是“小宗”,却起来侵犯公室,公然夺取诸侯的权

^① 《国语·周语中》。